



守护文学初心，《山花》依然烂漫

“从路遥到史铁生，从谷溪到陶正……一本陕北黄土高原山区小县的文学刊物，成就了文坛令人瞩目的‘山花作家群’，已经‘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了45年，深刻启示作家应该如何扎根土地，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生动阐释‘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有力证明只要植根于大地，植根于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一定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强晓玲、刘书云

像《山花》那样，植根于人民大众，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向上向善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山花》创办者、诗人曹谷溪

这是社会混乱叫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颗人丹……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路遥

在那个极端紧张的年代，几乎所有刊物停刊，几乎所有文人被迫搁笔，中国文坛处于异常沉寂的时期，唯独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这朵奇葩，不由得让人震惊！真是山花烂漫，异彩纷呈

——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原主席李若冰

陕北不大产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的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

——作家陶正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桦

县一级办文学刊物，全国可能只有一两个县。《山花》给延川赢得声誉，延川有责任呵护她

——中共延川县委书记张永祥

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桦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刊物树立了榜样，“《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油印机引发的《延安山花》

“《山花》是由一个叫曹谷溪的人‘煽呼’起来的。”提起《山花》，作家海波总会这样说。

1969年，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调查陶正——一名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竟然自己办了一张油印的报纸，其中转录了一些《内参》的内容，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原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陶正来延川插队时，在军大衣里偷偷包裹来一个油印机，并且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办了一张《红卫兵战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

曹谷溪见到陶正，便被这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深深地吸引，他激情、坦率以及远大的理想给曹谷溪带来极大的震动。一直以来，跟县里仅有的几个“文人”打得火热的曹谷溪就爱，人家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普及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敢？

回到县城，曹谷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时，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他觉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想法得到几个“文人”的一致赞同，包括中学教师闻频、县文化馆白军民，以及因“文革”结缘的“民办教师”王卫国（路遥），还有后来被曹谷溪以“民工创作员”名义“弄进”县通讯组的陶正。

很快，油印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在延川诞生。这本诗集无意中成为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来延川探亲的编辑看到，这位编辑将其更名为《延安山花》，在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

作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延安山花》公开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一时间，各地索要信函不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陕西延川县群众业余文化创作繁荣”的事迹。随后，诗集经过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连香港三联书店也有印刷发行的记录，诗集累计发行达到28.8万册，在当时创造了工农兵文艺创作诗集的发行奇迹。

1972年8月，《陕西日报》在显著版面发表了调查报告，点名表扬了返乡知识青年路遥。因为在《延安山花》的几位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是真正的农民身份，这也使路遥继“革命干将”之后再次成为延川的“名人”。

1974年，日本学者安本实在日本大阪书店买到一本《延安山花》。当时，他第一次读到谷溪和路遥的名字。2007年，身为大学教授的他把这本珍贵的诗集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为延川赢得了声誉，这一切是曹谷溪等创办者始料不及的。海波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眼望着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熟人一夜之间成了诗人。能发表作品的作者，顿觉浑身舒坦。一瞬间，曹谷溪由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文艺活动家。他时而把自己比作一只母鸡，时而又把自己比作一



▲ 1982年，在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会上，谷溪（左二）、路遥（右一）、陶正（右二）、白军民（左一）合影。

架人梯……业余作者从四面八方纷沓而来，曹谷溪的寒舍一下子门庭若市。”

1972年9月，受成功编辑《延安山花》诗集的鼓舞和启发，在延川县领导的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开始编辑出版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山花》。

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也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他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对于这段往事，路遥曾说，“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机制的诗歌集子，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社会混乱叫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颗人丹……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1991年，路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作序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戏剧的尾声部分，我们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在位于延安市区“谷溪书馆”里，一张路遥和曹谷溪年轻时在黄河畔的合影，被悬挂在重要的位置。“这是路遥生前最喜欢的照片。”站在宽敞的大厅里，曹谷溪告诉记者，那时路遥总是找他借书，更喜欢跟着他外出采访。1970年夏，两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农村采访。走到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高峻峰峦，俯视滔滔河水，顿时有了一种诗意”。曹谷溪背着海鸥相机，于是俩人用自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就在采访后不久，路遥创作出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县上召开文代会，指名点名要我去。人像小鼓一个劲播，一晚上折腾得不睡”。尽管只是“信天游”式的习作，但曹谷溪看到了路遥的灵气，把它推荐给《延安通讯》上发表，这是路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他走向文学跨出的第一步。1992年，路遥弥留之际，特地托曹谷溪放大了那张对路遥来说意义非凡的照片摆在病房。

《路遥传》的作者梁向阳（厚夫）说，“路遥走上中国文坛，与诗人曹谷溪不无关系。”

1962年高中毕业的曹谷溪，在公社灶上边抡勺把子一边提笔写诗，常常为擀面、炒菜发愁的他却常有文章、诗歌发表在报端。1965年，他被选派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很快，弹丸之地的延川县，提起写文章，大

家必提曹谷溪。甚至有年轻人卖弄学问时，都会遭到讥讽，“看你比曹谷溪还能行？”

后来，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再后来，一大批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川。《山花》也正是因为北京知青的参与，少了背洼洼里的局限而傲视河山。

陶正曾在文章中写道，“陕北不大产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的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他说，“在延川，我和谷溪、路遥等挚友，合力编印了一本小诗集，我们自己编辑、自己刻版、自己插图、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进去，辛苦而快乐，热情而狂妄。”

时为中学教师的闻频，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诗《大娘的话》，就是创办初期曹谷溪交给的“任务”。作品经《山花》发表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又被编入上海市1973年中学语文课本。闻频说，“今天看来，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但对于一个身居陕北偏远山区的年轻人来说，其振奋和鼓舞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年轻人既不能经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现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让人相信写诗可以改变命运。

闻频回忆，一次路遥穿着开花的黑棉袄，腰里扎着根绳子，拿着诗歌新作来求教，经过闻频修改，准备以表达失恋情绪的笔名“樱红”发表。闻频说，笔名最好简单好记又有含义，当时路遥想了想，便写下“路遥”二字。自此，也便有了“路遥”的公开亮相。

《山花》的创办，带动激励了一大批延川乃至周边的年轻人走上文学的创作道路。后来许多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家、诗人都曾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的早期作品。

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散文作家和谷，写了一首题为《访英雄》的诗寄给《山花》，不久，诗歌发表，惹得后来名震文坛的贾平凹羡慕了好长时间。著名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人，也寄来自己的诗作“敬请指正”。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回忆，他在延川插队的时候，就十分羡慕《山花》上的作品。《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花》编辑部成了全县往来信函最多的客户。在延川，因为诗歌，几乎人人都在作诗，更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

“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涉猎面不宽，语言表达差的农村青年来说，舞文弄墨的直接动机或许来自于改变生存环境。”曹谷溪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千方百

计地鼓励，竟然大有成效。闻名乡里的“牵头”（秧歌队领头）海波，13岁辍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同学，也是《山花》创办者之一白军民的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轻易接纳。怎么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编辑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开场合讲道，现在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海波，当时水平差得可怜，在《山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几乎都是几个编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我们很高兴。”

海波说，《山花》通过这些事例为农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努力创作，前途无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间更加刺激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活得像路遥一样，已不自觉地成了人们的人生理想。《山花》也就更红了。

世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

“在那个极端紧张的年代，几乎所有刊物停刊，几乎所有文人被迫搁笔，中国文坛处于异常沉寂的时期，唯独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这朵奇葩，不由得让人震惊！真是山花烂漫，异彩纷呈。”李若冰曾在《山花》上发表过自己的诗作，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山花》的出现，打破了文艺界长期沉寂的局面，其影响波及全国和海外，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种在荒芜的文坛出现的特异现象。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长期关注“山花文化现象”的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认为，《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山花》的“破土而出”，绝不是简单的个案和偶然。

在陕北，古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

唐代出过陕北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清代有李清照式的女诗人李婉妮，这都是延川县志上的荣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川是陕北最早“闹红”的地区之一。1935年，延川县纳入陕北苏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宣传采风，陕北地区民间文化得到广泛发掘整理，陕北民歌、说书、道情、秧歌等从山野走向革命中心。延安时代出过一个杨静农，他所率领的抗战剧团堪称苏区文艺先驱。李若冰当时是剧团里的娃娃兵，杨静农是他的恩师和领导人。（下转10版）